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发展的 困境及其原因探究

陈许¹

（贵州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摘要】针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现状，对当前农村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原因有三：一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发展的衰落；二是农民精神生活的荒芜；三是民俗传统被抛弃。就其阻碍发展的原因探析有三：一是城乡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二是农村组织的涣散；三是文化发展主体的缺失。

【关键词】农村文化 困境 原因

【中图分类号】F279.27 **【文献标识码】**A

1 当前农村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

1.1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普遍衰落

40 年来，我国各方面政策逐渐开放活，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到城市中去，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大陆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0.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4.38%。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农村的衰落显而易见，其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1 农村人口锐减

农村人口减少在未来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会持续是不争的事实，笔者在贵州三穗县少数民族（以侗族、苗族为主）某些村落走访发现，进入村子，只见楼房不见人，除了春节期间，村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农村吸引力的丧失，致使人口大量流失。

1.1.2 耕地荒弃和农业用地被占现象同时存在

耕地撂荒也成为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的一个普遍现象。尽管农业有了补贴，但进城务工相对于土地收入相当可观，而当下农村的青年人，也不大情愿去学习农业知识，所以就出现了年轻的一代不想种地、不会种地的情况，加之土地分散、小农经营，从碎片化的土地上获取收益既辛苦又微薄，土地便弃置荒废了。

城镇化在挤压着农村的发展资源，除了人口单方面流向城市外，农村的土地也是一直单向流向城市。一直以来，各方用地都是从农村征用，据农业农村部调查，最近几年农民因为土地上访的案件高达 65%。笔者在贵州三穗县某村走访得知当地有着“八

作者简介：陈许（1988-），男，河南宜阳县人，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农村问题。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编号：2018qn31）。

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当地山多地少，耕地十分有限，户均只几分而已，由于新修的高速公路从村子里穿过，耕地被占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失地的农民。

1.1.3 基础设施破败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基础设施短板明显。在一些偏远农村地区，农民的饮水及饮水安全问题、生产用电问题、通组通户道路硬化问题、农村物流问题等亟待解决。笔者在贵州省三穗县了解到很多行政村没有配送网点，收发包裹需要花费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到乡镇上去，极为不便；农村书屋管理不到位，读者极少；乡镇卫生院、乡村医务室设施简陋，难以满足农民的需求；农村的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处理等问题也严重滞后。

1.1.4 教育资源不足

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并因长期“二元制”结构和城镇化的影响，农村教育滞后、师资缺乏、生源减少、学校合并。笔者自身经历和走访的过程中发现，农村适龄学童数量快速下滑，一些乡镇里只有小学，初中以上都需到县城里就读。这些孩子多数又是“留守儿童”，远离了父母管教，往往荒废学业、沉溺游戏，甚至影响身心健康，对孩子们的成长十分不利。

1.2 逐利思想驱使下农民精神荒漠化

农民的价值观念深植于农村文化的沃土之中，是引领农村文化振兴的根本和支撑。传统的中国乡村，基本上处在一个“熟人”圈子，无形之间有了一种规范的约束，形成了农耕文明特有的价值观念，如人心向善的道德观、诚实守信的人格观、勤俭节约的消费观、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等。近几十年来，受工业化影响，农民的传统观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加之市场经济影响，婚嫁“红喜”开始追求豪华，以及比房子、比车子、比彩礼、比排场，甚至出现了天价彩礼让人“娶不起”的现象，乃至造成悲剧的发生。

人走了，村空了，传统的农耕方式和技艺被抛弃，传统民间文化面临断代的危险。在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也面临同样的局面，民族服饰逐渐稀少，民族风俗习惯也慢慢淡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不会说本民族语言、更不能写本民族的文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正在逐渐消失。而同时，在市场逐利的影响之下，农民的身份认同也产生了极大改变。在小农经济思维模式下，传统中国的社会阶层在历史上长期分为士农工商，农民的社会地位并不低。进入现代社会，经济至上，破败的农村、贫困的农民自然成为了弱势群体。由于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致使农民对自身生活方式和身份进行否定，“走出大山”“鲤鱼跃龙门”“捧上铁饭碗”成为转变身份、改变命运的重要选择。笔者通过走访，乃至自身的经历都长期以为待在农村没有出路，只有走出去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1.3 民俗传统无以为继

民风、民俗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是一个地方文化在世代相传中的积淀，可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往往被贴上落后的标签。“由于一直强调现代化、城镇化在经济发展领域的主导作用，人们产生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观念：唯有城市代表着先进、文明或历史前进的方向。而乡村则代表着落后、封闭、愚昧，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不足以支撑我国现代化发展，应该在城镇化的进程中逐步改造乃至淘汰。”当前，农村各种文化形态的民俗不仅受到西方文化、现代理念、城市发展、网络空间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乡村人口锐减，大量涌入城市的内在因素影响，以致其生存空间萎缩并日渐式微。由于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及运行机制产生了重大改变，乡村文化“在经验层面、话语层面和规范层面几乎同步发生不可逆转的激变”，很难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在乡村渐失优势，农民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也日趋薄弱。民间文化遗产、文化景观渐渐消失，各种民俗节庆不兴，各种农耕方式及技艺被抛弃，传统民间文化面临断代的危险。

2 制约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文化振兴的原因

2.1 城乡结构限制了农村文化的发展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由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提出。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和城市之间人为设置的鸿沟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长此以往难以突破，以致在放弃计划经济，逐渐走市场经济后，这种继续产生影响的城乡分离的市场体系、城乡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城乡有别的治理体制与城乡不均衡的公共服务建设等遗留问题引起农村人口大量离开家园，农村的社会秩序遭到瓦解，经济发展难以为继。而这些最早离开农村的就包括民间艺人，他们的离开，使农村缺少了技艺、艺术人才，直接导致农村文化气息的没落，而这些民间艺人离开了农村，也就离开了孕育其技艺的源泉，这些传统技艺的传承和创新缺乏其生存延续的文化根基；而农村的“文化精英”走出去后，使得农村缺乏乡村文化传承、创新的资源和人才，造成本就没落的农村文化出现断层，后继无人，而新的乡村文化又不能马上树立起来，农村的文化建设失去了精神支撑。

2.2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涣散

农村是国家行政单元中最底层的一个单元。古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农村是属于“长老统治”，农民处在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格局之中，是以乡绅、地主及宗族等为代表的力量对乡村的间接管理。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建立了“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等集体经济形式，之后虽有“左”倾错误，但事实上起到了团结和牢固农民的作用，加强了农民的组织性。

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每个农民都是一个完整的经营个体，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呈减弱趋势。笔者走访发现，在这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大山阻隔，交通不便，加之人口的流出，组织程度更是软弱，作为战斗堡垒功能的基层党组织——党支部在一些地方难以起到带头作用。这些都反映出“包产到户”之后，农民的自主性增强了，但集体意识也随之淡化了，从原来的组织中跳出之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组织性也越来越淡薄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浪潮中，农村的传统社会组织形式也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制度的更迭、人口的流出而消失，而新的组织形式确没能伴随着新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发展起来。

2.3 农村文化振兴主体的缺失

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是推动农村文化振兴的主要力量，而这三者在当下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够、不得力。

2.3.1 政府的失灵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把经济建设作为全部工作的重点，文化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突飞猛进，特别是农村的文化建设更是陷入边缘化。笔者走访贵州某县几个乡镇了解到，乡政府长期以来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不管是物力、人力还是财力都集中在当地经济发展上，专门用于文化建设的投入十分稀少。在某乡政府驻地所在的村，村内唯一的娱乐场所就是乡小学校园内的一个篮球场，全乡没有一家经营性的文化娱乐场地，仅有的农民书屋也没有发挥其作用。而一些地方看到了自身特有的文化资源优势，以此打造特色旅游来带动经济的发展，但结果又往往不尽人意。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市场化开发也导致乡村民俗文化越来越失去本来的面目，文化产品在迎合市场需求的前提下不断改变其艺术审美，传统工艺被摒弃，最终打破了乡村民俗文化的面目，导致乡村文化的割裂而难以传承。

2.3.2 传承文化的主体缺位

文化需要人代代相传，农民是孕育乡村文化的主体，也是推动乡村文化延续发展的主体，也是当前农村文化振兴的真正依

靠着。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乡村生活方式逐渐改变，农民迫于生计或者发展需要，选择前往城市就业或定居是当下的新常态。据数据显示，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农民工平均年龄40.2岁，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5.2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69.9%。可以看出，农村绝大多数的青壮年离开乡土，一些乡村“空心化”，留在农村的只有“386199部队”，即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而他们由于因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各方面不利的因素制约，缺乏创新能力和积极性，对农村的发展及农村文化建设难以承受其重，因此，农村缺少振兴文化的主体——人，成为当下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人口的流出首先就是农村社会精英的流失，这一部分人在乡村往往是道德的标杆，对文化的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村精英人士的严重稀缺，客观上削弱了农村文化振兴的有力支柱，致使外来的投入不能内化为农村自己的力量，导致农村文化振兴举步维艰。

2.3.3 社会组织的不健全

当前，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处于发展初期，各方面还不成熟，其面临的挑战异常艰巨。首先，当前社会组织处于发展初期，数量极少，还没形成规模，相关管理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农民能够加入的社会组织十分有限，量小、种类不全，可选择性不多，与农村对于文化方面服务的需求之间的差距较大，导致其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能力不够。其次，社会组织的相关法规不完善，缺乏健全的有关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体系建设，制度方面的不清晰、不明朗，不能营造出一个促使社会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最后，社会组织的定位不明确，一些地方、一些领域，社会组织与政府混为一体，角色不明，现如今一些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还未完全剥离，在实际职能行使上，双方还未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大多变成政府的下级机构或者附属机关，自身缺乏独立性，导致其在参与文化建设方面的工作，不能够完全独立策划、独立把控。

综上对当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困境及阻碍文化振兴的原因分析，必须抓住“人”这个关键，让农村能够留住人，能够吸引人，并坚守农村文化的本位，才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参考文献:

[1]吴理财.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文化的变迁[J].人民论坛,2011(08).

[2]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J].建筑,2019.

[3]徐顽强,于周旭,徐新盛.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价值、困境及对策[J].行政管理改革,2019(01).